

【编者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人一直纠结于自身千年的历史传统与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输入中国的西方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之间。一些人鼓吹“回到传统”，一些人强调“全盘西化”。随着近些年西方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增长、族群冲突、外交政策等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史、文明史和价值体系，探讨在21世纪中国应走的道路，开始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其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族群观更是讨论话题之一。

本期《通讯》介绍了赵汀阳和葛兆光两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与专访，还收入了《南风窗》对复旦大学丁耘教授的访谈，其中谈到儒家提倡的“天下”观在今日世界是否现实可行的观点。希望大家也来了解和关注这一议题。何谓“天下”？何谓“中国”？何谓“边疆”？在中国各群体的传统观念中，中原王朝如何看待周边的政权？周边群体如何看待中原王朝？中原民众如何看待周边群体的“入主中原”？中原王朝统治集团如何看待下辖的周边“蛮夷”臣民？其治理理念与西方各帝国的统治集团有什么差别？鸦片战争后，中国今天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自我意识和族际交往中的观念与历史上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与西方（包括苏俄）对中国的影响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都是研究今天中国族群关系的人必须思考的。

偏重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家，在面对社会现实、脚踏实地的同时，还必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变迁的宏观脉络，这样才能做到“高屋建瓴”。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就无法把握宏观的社会变迁历史走向。费孝通先生晚年一再告诫我们，在重视实地调查之外，要特别关注历史学 and 心理学，这是非常有道理的。（马戎）

【专 访】

“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信仰¹

赵汀阳

人总是无法忘记自己从哪里走来。中国人对“中国”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存在，始终具有难以形容的情感牵连，其中甚至有神秘主义的因素。“中国”何以如此具有魅力，有如一个人存在的母体？

而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自身，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关系模式也随之变化，我们正在返回古代的“中国”去寻找文化、精神的资源，甚至政治资源，并带到现在，参与构造我们和世界的未来。

2005年，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书《天下体系》出版，在国际上引起广泛讨论，这是用中国的方式对世界说话，表明“中国”具有为新的世界秩序建构提供思路的能力。10年后，他继续进行广度和深度思考的两本新书《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和《天下的当代性》也将出版。面对今天中国和世界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倾听到来自哲学家和古代中国的声音。

近日，《南风窗》记者对赵汀阳先生进行了专访。

“中国”一直在生长

《南风窗》：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这是1949年以来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翻开了两岸历史新的一页。两位领导人都谈到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¹ 本文刊载于《南风窗》2015年12月2日-15日（第25期）第85-88页。



“中国”这个概念，超越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曾经的敌对，具有无法抗拒的巨大合法性和感召力，就像你所说的是一个“神性概念”。为什么会如此呢？你很快就会出版两本书《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天下的当代性》，能不能“揭秘”一下？

赵汀阳：在新书里我试图对中国的概念给出一种解释，但中国这个概念对我仍然具有需要不断思考和体会的神秘性，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神秘性诱导我去研究中国的存在方式。

不过，“合法性”的提法却使我有些犹豫，因为我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概念，并不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中国的存在方式相应的是可能性、必然性、合理性、有效性之类的历史哲学、存在论、甚至博弈论的问题，并不涉及合法性之类的政治学概念。

《南风窗》：作为哲学家，你是从哲学上而不是政治上去分析“中国”这个存在。但如果“中国”是一个神性概念，面对这个存在，显然在国家统一中可以成为合法性资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它属于“中国”这个存在“可以用来干什么”的范畴，而不是“本身是什么”的范畴。我们返回关于中国存在的哲学问题。

赵汀阳：一种存在自身的有效性就是这种存在的存在论证明，或者说，存在的证明在于它的自明证据（self-evidence），而不需要相对于某种外在的或主观标准而被评判。这就像，太阳的存在证明就是“太阳存在着”的事实，并不需要根据我们的观点去判断它为合法事实，假如说，“太阳是个合法的存在”，这句话恐怕有些好笑。

我试图研究的是，什么是中国历史的历史性？或者说，什么是中国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有点绕，允许我稍加解释：一个存在的历程有其历史（history），或可能只是一些过眼云烟的兴衰成败或快意恩仇故事，并非所有的历史过程都具有为时间塑形的历史性（historicity），即一种存在的历史过程不仅仅存在并流失于“时间之中”，而同时是一种对时间格局的建构而存在于“时间之上”，因而形成一种重新定义时间的存在秩序，也就变成了一个永恒的概念，这种超越了流失的时间性的存在秩序就是历史性。

也许还可以说，历史性就是不能还原为时间刻度的历史刻度，是时间之流无法磨灭的存在秩序。这样的解释仍然还是比较抽象，也许可以不太准确地比方说，项羽之勇，韩信之智，西施之美，都已消失而不可见，但其勇其智其美却已经成为概念。

中国的历史性建构了一种存在秩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存在本身并没有消失，而仍然在生长过程中，因此，中国的存在方式不仅是个概念，也是一种天命的实践。

《南风窗》：比如？我们可以举些例子。

赵汀阳：大例子说来话长，还是举个小例子。曾经遇到过不少好几代人以前就移民的华裔，有的甚至没有来过中国也不会汉语，对于他们，中国已经有些抽象了，但按照其说法，始终心系中国。我问过中国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一种比较典型的回答是：中国是他们的一个永在的家园，就像一个想回就可以回去的家。

我能够感觉得到，中国是一个具有“精神粘性”的概念，一个具有存在论力量的概念，这种存在论的力量超过了知识的或伦理的认同（我注意到许多华裔关于中国的知识并不多，而生活规则也已经西化）。

我想，中国的精神性就隐藏在其不会在时间中流失的历史性中，就在其存在方式本身。当一种存在本身具有精神性，那就是神性的存在。

“中国旋涡”

《南风窗》：《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看上去首先是一种事实判断，“肯定是这样”。但好像又是一种价值判断，“应该这样”。为什么在人们心中，“分”久了就应该“合”，就应该“统一”呢？



赵汀阳：从状态上看，合是统一；如果从动态上看，合是一种向心力之大势。“势”的概念具有深意，是一个历史动力学概念，而不是一种主观计划。人们为什么有着支持“合”的集体心理，或许更应该请教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许与历史经验有关，统一王朝之岁月静好时间通常似乎较长，或许，“合”在心理上更接近一个完满结局的感觉？

即使在西周分封时期，众多诸侯之“分”仍然从属于一个“合”的天下体系，如此等等，相信原因多多。关键在于，为什么中国具有一种持续向心力而在客观上形成合之大势？这才是我试图解释的，我将其理解为，大概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经过秦汉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中国旋涡”。其中细节还请看书里的叙述。

《南风窗》：书里肯定很精彩。但“中国”这个神性概念的发生逻辑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我想很多还没看过书的人，都想听一听你来描述一下，让我们了解了解。

赵汀阳：具体的演化细节只能看书了，这里无法复述，只能非常简练概括地说，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具有其互相作保的两面，即中国存在的历史性与精神性合一模式：一方面，早期中国多地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天下逐鹿的博弈游戏，游戏之始或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经过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天下逐鹿的游戏逐步形成了逐鹿中原模式，后经秦汉定型，又经过历代的强化，中国大地上四方之民莫不俱至，众多部族纷纷加入或被卷入逐鹿游戏，于是形成了越来越大的“中国旋涡”。

《南风窗》：“中国旋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或许可以揭开一些秘密。

赵汀阳：中国旋涡是一个向心卷入的运动，而非向外的扩张运动，卷入的博弈参赛者越多，中国旋涡就越变越大，这一点似乎可以有效解释为什么中国是非扩张型的国家却得以越变越大。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古代中原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以至于众多部族非加入逐鹿博弈不可？我相信，其根本动力学原因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物质财富之争，而是各地政权争夺中原所建构的精神世界的使用权。

财富之争夺只能解释洗劫或占领中原的兴趣，却无法解释众多部族都乐于将自己加入中原“正统”的叙事动力，也就是证明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历史叙事动力。

解释力的限度意味着统治或支配能力的限度，处理或管理能力的限度意味着实际控制力的限度，因此，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叙事传统和具有大规模管理能力的制度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源。

《南风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所以政权的更迭，预设“入主中原”最大的政治资源的一种转移。有哪些概念最具有吸引力？

赵汀阳：古中原所建构的精神世界是古代中国大地上具有最大解释力和最大知识生产能力的思想系统和制度系统，其中，“配天”和“天下”的概念最具吸引力，因为这两个原则都是向一切人开放的普遍原则，显然，没有比“天”和“天下”尺度更大的普遍性了，也就蕴含着最大的政治解释力和建构秩序的能力，因此就是具有最大能力的政治资源，可想而知，中原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就是众多博弈者必争之最大资源，它能够保证规模最大的统治方式以及长治久安的秩序。

每个强大的竞争者都愿意加入天下政治的叙事去建立最大规模的统治，不仅中原政权如此，四方众多政权也是如此，例如从鲜卑、契丹、女真到蒙古和满洲，包括其他未能成功入主中原的政权也尽皆如此。

“中国”的存在方式就解释了自己

《南风窗》：“西方话语”现在好像在中国属于被“警惕”的对象。一种话语就是按他们的说法中国没有“宗教”，所以很多人说中国社会有一些突破了道德底线的坏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缺乏敬畏之心。这个说法不对，我们都喜欢说“头上三尺有神明”。可没有一个像上帝一样的存在看着我们，是一个事实。



而说到“中国”，你说，中国的存在是一种另外的神圣性，是不需要表达为宗教的。中国信仰就是中国本身，这个巨大的时空存在，就是中国的信仰。“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中国存在的时空，中国的整体性，就是中国的神庙—我们都住在中国的神庙里面。”我想很多人并不是很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信仰，好像跟人们日常所说的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

赵汀阳：中国本身作为中国之信仰，当然不是通常所说的宗教，除非在广义上或在比喻上使用宗教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信仰，却不能反过来说，信仰都必须是宗教。认为信仰必须是宗教，而宗教必须是一神教，这是一神教的独家想象，不是普遍事实。

《南风窗》：非常有道理！而懂得这个道理，仅仅需要诉诸于简单的逻辑。

赵汀阳：不仅多神论是信仰，甚至无神论也可以是一种信仰，比如说有些人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对科学的无条件崇拜也就是信仰了；或者，佛教是宗教，却是无神论。所谓中国是中国自身的信仰，意思是，中国构成了中国自身的存在论依据、目的论依据和方法论依据：中国的存在方式解释了中国是什么、从哪里来、如何生长、何以长存，也可以说，中国的存在方式构成了对中国的自证，这种自相关性就意味着神性。所有神性的存在都是自证的。

如何去尊重“他者”

《南风窗》：从逻辑上来说，有“中国”，就必然预设了有“四方”。所以在古代，“中国”这个概念，好像还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说法没有歧视估计都没多少人信的概念有所联系。说明古代的“中国”还是有“自我-他者”意识的，也许这个“他者”面目还不好看。

所以葛兆光先生对你提出了质疑，认为你哲学上的“天下体系”只是一种乌托邦想象，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他举的例子是以汉唐为例，到处攻打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古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一直试图按照‘天下/帝国’的文化标准去行事”。你打算怎么回应这类批评？

赵汀阳：那种所谓“歧视”的说法是现代广为流传的对古代中国的误读。中国最早的意思是建于“地中”之都城，后来才演变为指称中原，再后来指称整个中国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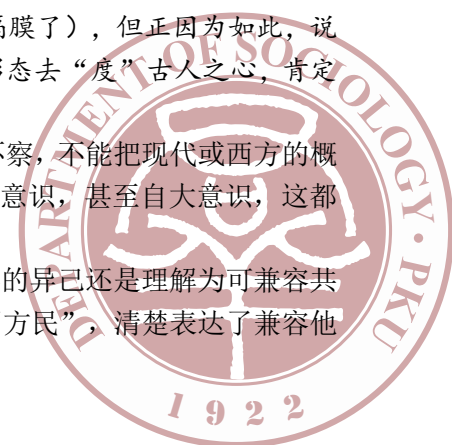
对于远古农耕社会，最重要的权威知识是服务于农业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冯时有专著论述了这个问题），因此，早期中国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人的理解都建立在天文地理的概念上，诸如四时四方之类，于是，各地的人只是分别居住在地中或四方之人，没有种族或民族概念，只有空间方位概念，各地的人都是天下四方之人。

春秋战国开始流行的西戎北狄东夷南蛮说法也是《山海经》式的人类学描述，并非种族或民族歧视。古代各地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利益与权力之争，尚未形成现代的那种“文明的冲突”，正如司马迁所概括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利益冲突时，互相贬低对手也属人之常情，但决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歧视和对立。

《南风窗》：是我们按现在的心理模式、观念模式，去理解古代的语言结构而形成的“认知幻象”吗？我们确实已经不知道古代人是怎么想的（哪怕有语言留了下来可供语言分析，但要进行心理分析，确实缺了一个情境—我们跟那样一个情境在心理上太隔膜了），但正因为如此，说“肯定是这样”或“肯定不是那样”在认知上都有点冒险。按意识形态去“度”古人之心，肯定没意思，但对他们最合理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呢？

赵汀阳：意识形态是基督教的发明而成熟于现代，这一点不可不察，不能把现代或西方的概念倒映为古代中国，那样就变成伪造事实了。至于自身-他者的差异意识，甚至自大意识，这都是自然人情，人皆如此，连夜郎都有自大之心。

这一点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把他者理解为不可兼容的异己还是理解为可兼容共在的别人，或者说，是不共戴天还是共享天道。《尚书》谓“和恒四方民”，清楚表达了兼容他



者的原则，而且还清楚说明了，人是以空间地理去定位的，所谓“四方”，而不是以种族去定义的。兼容他者而不以普世原则去统一他者，才是对他者的真正尊重。

《南风窗》：既然如此，如何解释汉唐（其实从秦就开始了）等并不是按“兼容他者”去行事，而是对“四方”有攻打杀伐之举？这是你的“天下体系”被认为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直觉上通不过检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汀阳：天下概念本来就是一个理想，即使周朝的天下体系也只是天下理想的一种不充分实践。何况秦汉改制以来，天下体系已经结束了，因此，秦汉之后的大一统中国不能与先秦的天下体系混为一谈，更不能用秦汉之后的历史去解释先秦的历史，那是“关公战秦琼”了，甚至是指鹿为马。混同不同性质不同时代的事情恐怕无益于思想和知识生产。

古代中国是个非扩张型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经常有人举出唐朝的进攻行为作为反例，可这是一种历史误读。

需要提醒几个事实：首先，古代中国大地上的博弈是政权之争，而非现代意义的国家之争。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四方之民，它们时而入主中原就像中原时而控制漠北或东北一样，都是政权兴衰成败之天命，决计不能单方面地认为，只有中原可以统治漠北而漠北就不能统治中原。那才真是帝国主义的单边霸权观念。

其次，唐朝的进攻实乃防守反击。唐朝初年，突厥曾经攻入中原，并且长期侵扰，才使唐朝在实力壮大时反击而获胜。假如防守反击都能被定义为侵略，那真是无理可讲了。顺便提醒，唐朝皇家实为鲜卑，唐朝的高官大将中，非汉人的比例很大。如果实事求是地给予定位，唐朝应是一个以鲜卑为主导而万民一体的伟大王朝，决非儒生们一厢情愿想象的汉人王朝。

《南风窗》：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跟我们按现在的心理想要它是什么无关。

赵汀阳：唐朝确实也以各种纠纷为名攻打过一些边缘政权，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概念倒映为古代，因为古人不是那样思考和理解的。在唐朝眼里，边缘政权都是地方割据而不服管理的政权而已，决非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事求是的史学恐怕比蒙太奇的甚至时空穿越的史学更可信一些。

现在世界正是一个“改制的天时”

《南风窗》：假设有人指控，“中国”、“天下体系”这些概念其实较自我中心主义，较自恋，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止步不前，被人打痛的原因，打痛后才痛感要去拥抱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比如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你会怎么评价？

赵汀阳：假如谈论中国就是自我中心，那么谈论美国就是美国中心，谈论法国就是法国中心，如此类推，结果就无法谈论任何问题。这是当代的“政治正确”陷阱，“政治正确”的结果就是限制了思想和学术的自由。

至于天下的概念，就更不是自我中心了，天下是关于世界无外的概念，所有地方、所有人都属于天下而拥有天下，《吕氏春秋》和《六韬》等古书都清楚定义了无外之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假如说，天下是一个由中国提出的普遍概念，所以就是自我中心的，那么同理，西方提出的自由民主法治也是自我中心的了。

逻辑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如果在逻辑上都通不过，又何以谈论普遍性？我记得你曾经和我讨论过国人经常不讲逻辑的问题。

《南风窗》：是，我们讨论过作为一种现象的“中国人不讲逻辑”的问题。我的一个直观感觉是，现代的民族国家采用了和“天下体系”不太一样的游戏规则，但稳定性存疑。那中国会不会要经历一个类似于“异化规律”的路径，开始是自身的某种原初状态（先秦），在近代被迫按民族国家的游戏来博弈，然后在现在发展壮大了自己，最终，还是要“复归自身”，在新的“天下”（全球体系）中起“负责任的重要作用”？



赵汀阳：先秦是“中国的天下”，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秦汉至清是“内含天下结构的中国”，即以世界性为其内在结构的国家，传统的说法是大一统国家，现代中国只是“天下中之一国”，即世界中的一个主权国家。

不过，现代主权国家并非必须是民族国家，事实上，现代主权国家有两个主要类型：以欧洲各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类型；还有以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多民族合众国类型。如此显眼的现代事实却长期被民族国家概念所遮蔽，倒是怪事一桩。难怪维特根斯坦提醒说，要看，不要想。

民国学者们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确实与西方的游戏规则有关。现代中国加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游戏，自然就要采用现代游戏规则，中国以清朝之遗产而改制成为现代主权国家，而当时的现代国家理论以民族国家为准，于是中国必须解释其多民族一体的问题。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既承认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又试图消解狭义的民族概念，不失为一个可行概念。不过，中国人本就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中国人”这个概念更接近“中国”这个存在的含义。

未来如何，谁也不知。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这又是一个改制的天时。正如博尔赫斯所言，未来是时间之分叉，就是说，存在多种可能性。我所讨论的新天下体系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我只是猜想，天意应在于能够配天之天下。敬天而行吧。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7825.html）

【论 文】

何谓中国——中国的生长方式¹

赵汀阳²

各位朋友好，刚才黄平说我有一本新书（《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即将由中信出版，所以特别期待能够得到各位朋友的批评和建议，以便能够不断地推进。说实话中国是一个最难的话题，在做中国研究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天下的理论。然后再重新做回中国，这个故事很长。

在1993年之前，我基本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在这之后我主要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1995年北大的朱苏力教授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所以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容易变成研究中国的土特产。朱苏力这个问题其实想问，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东西？

我首先要感谢黄平，认识他之后我关注到社会学，也认识到社会学很多大师的著作。同时认识了王铭铭，从他那里知道了人类学的知识，包括他喜欢的格尔兹，这些方法对我非常有益。到后来认识更多的学者，包括今天这几位好朋友，我从他们那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不断的骚扰他们，经常向他们提问题。应该说从我转向中国研究以来，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朋友为师，因为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诸如此类，所以所有的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¹ 2015 京城国际论坛分论坛二，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51104130235.html>。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